

# 将“寻根”进行到底

樊 星

(武汉大学 文学院, 湖北 武汉 430073)

## 一

1985年前后热闹一时的“寻根文学”好像没过多久就被后起的“新写实小说”的强劲势头盖过了。一部分“寻根派”作家也很快销声匿迹了。然而,仍然有作家将“寻根”的旗帜一直举着,不断开掘出“寻根”的富矿。如1990年代中贾平凹的《怀念狼》、韩少功的《马桥词典》,还有莫言发表于2000年以后的《檀香刑》,都是“寻根派”作家追寻我们民族的野性、抗争精神、文化奥秘的重要收获。此外,张承志的《心灵史》、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姜戎的《狼图腾》、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……也都浸透了“寻根”的精神。应该将1980年代的“寻根热”与1990年代以后的上述“寻根”力作联系在一起,看作当代作家追寻民族魂的思潮的重要收获。从新时期之初汪曾祺呼唤“回到民族传统”到以唐浩明的《曾国藩》、刘斯奋的《白门柳》、凌力的《少年天子》、徐兴业的《金瓯缺》等长篇历史小说为代表的写历史、弘扬民族精魂的浪潮,也都与“寻根热”形成了前后的呼应。而值得研究的是,各位作家在“寻根”的浪潮中有哪些独到的发现。

## 二

我曾经在《禅宗与当代文学》一文中谈到——  
韩少功是“寻根文学”的代表人物。他一方面追寻楚文化的“奇丽、神秘、狂放、幽默深广”,另一方面叹服道家与禅宗的“宇宙观”和“思想方法”。<sup>[1]</sup>在他看来,“中国的庄禅哲学从来就是以非理性为本位的。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孟为表,以庄禅为里;以孔孟治世,以庄禅修身。”<sup>[2]</sup>一直到“寻根热”过去以后的1992年,他还开始研读佛经。<sup>[3]</sup>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这一份真情使他不仅写出了富于禅理的小说,而且在2001年于湖南汨罗山乡营造起“隐居”的宅

第,在那里种菜、种树、养鸡,“亲近山水”。<sup>[4]</sup>

韩少功最有名的“寻根文学”代表作是《爸爸爸》和《女女女》。两篇作品都旨在批判传统文化的痼疾,但也足以催生出关于蒙昧与神圣、壮烈与残忍、克己与奢望之间混沌莫辨的深长之思来。其中的是非非,一言难尽。还有《归去来》《诱惑》《寻找月光》这样的作品,则集中显示了作家对人生的混沌性、复杂性的富有禅理的参悟。《归去来》通过知青回乡的奇遇写“恍兮惚兮”的人生体验,又由这体验生发出关于自己的来历、关于人类起源的神奇遐想,隐隐透露出自我的迷失与寻找的禅宗命题;《诱惑》是对知青生活一段经历的回忆;在苦闷中挣扎的知青们到了永恒的大自然中才体会出“瞬间就是永远”的禅意,奇山秀水的美丽传说与惹人遐想似乎消泯了现实的烦恼,同时漫长的跋涉又催生了新的担忧与寂寞,而在目的地发现的刻字又为什么使他们产生了凄楚的空白感?

一切的感受都微妙而奇特,传达出人与自然、人与自我、人与人的复杂况味。此外,在《爸爸爸》《女女女》《归去来》《诱惑》这些作品中,都有一个潜在的结构:寻找与幻灭。那些寻找悲剧根源(如《爸爸爸》中对村庄衰落原因的执着寻找)、寻找母性感觉(如《女女女》中主人公的故事)、寻找故迹和新感觉(如《归去来》《诱惑》)到头来都是虚空,也都体现出作家对世界的悲悯顿悟:一切都混沌一片,一切都归于虚无。《寻找月光》则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看纷乱的事,表现了孩子与成人世界的隔膜:成人眼中的大事在孩子的眼中莫名其妙,成人之间的矛盾在孩子那里也不可思议。人世间的隔膜不正好是人世间的非具有相对性的证明么?在《马桥词典》中,也充满了奇特的禅思:关于“每一个人都是全人

收稿日期:2018-11-10

作者简介:樊星,男,湖北武汉人,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,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,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,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类的后裔……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?还仅仅是一个人吗?”的遐想,关于“每一个对义的词,都是不同理解的聚合,是不同人生实践路线的交叉的点,通向悖论的两极”的感悟,关于“马桥人有很多语焉不详的混沌意识区”的发现,关于“一切都是有意志的,有生命的”的感觉,关于“人的感知各各不同,就是一个人的感知,也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”的思考,关于“时间的歧义性”的洞察,关于“生活的荒诞性和神圣性,就奇异地融合在一起”的参悟,关于“道理是有用又没有用的,是讲得清又讲不清的”和“说话不容易,我的话一旦飞出去,经常播种着误解,生长出令我惊异的喜悦或悲哀”的发觉,关于“世界上自从有了语言,就一次次引发了从争辩直至战争的人际冲突,不断造就着语言迷狂”的感慨……都点化了人与人类、感觉与语言、明白与含混、个性与误解之间的玄妙关系:一切都是理性难以企及的,一切又都是可以凭悟性豁然感知、理解的。到了《暗示》这部通过对“具象”的观察与思考探索“言词未曾达到的地方”的丰富意义的作品,作家更引用了“立地成佛”的佛言,表达了这样的现代人文主义思考:“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停下来,跺一脚,说这里就是地球的中心。你可以在眼前任何一片叶尖的露珠上,看到你灿烂的幸福。”书中“卷四:言与象的互在”专门有一节“慧能”,其中引述了《六祖坛经》和《金刚经》关于“不立文字”“说法者无法可说”与道家“大辨不言”的古训,以表达作家对禅宗智慧的认同:“任何言词的显义之下,暧昧不明混沌莫辨的隐象纵深无法把握。在那个纵深里,一丝明暗的闪烁或者任何一缕冷暖的飘移,都可能使显义即刻哗变,远远逃离字典的约定,逃离公共的约定。”这样,“理解是误解的别名。”这样的思考启迪读者去琢磨“显义”与“隐象”之间的差异,注意“‘隐象’的千差万别,包括深隐和浅隐的差别,隐此和隐彼的差别”,进而洞察这样的世态:“为什么人类几千年来有过那么多道理,但还是有太多刺心的悲剧;……为什么很多道理差不多已经成了深刻、周密、漂亮、通透的精品,仍会遭遇人世间太多茫然而冷淡的面孔。”在此,作家不仅借禅宗智慧透辟地揭示了语言的复杂性、语言与人生悲剧的深刻联系,而且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(例如哈贝马斯)关于通过“对话”重建“公共领域”的“理性民主”和“理性宪政”的经典理论提出了建设性的质疑。(《当代作家评论》2005年第3期)

在我看来,韩少功在创作中融入的禅宗思维,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批判与反思,写出了人生与世界的混沌感,这样就与米兰·昆德拉关于“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。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:‘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。’这是小说的永恒真谛”的说法不谋而合了。<sup>[5]</sup>当批判不止于批判,而融入了对命运、文化的玄思时,一种文学的混沌感就呈现了出来。

### 三

出版于2006年的随笔集《山南水北》,则使人在亲近乡村的趣闻、秘史的同时产生了对于生命、宇宙的浩叹。

作家在移居海南后,又在曾经下乡的湖南汨罗建起了房屋,过上了“融入山水的生活,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”,很容易使人想起陶渊明和“竹林七贤”的魏晋风度。然而,这本书里对于那些乡间奇闻的记录还是饶有新意的。中国文学素有传奇的传统,从牛郎织女、田螺姑娘那样的神话到老子出关、达摩一苇渡江那样的传奇再到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中的那些魔幻描写,一直到各种武侠小说,都凸显出传奇的风采。《山南水北》中,多有记录乡村奇闻的篇幅,从《智蛙》《再说草木》那样对于动植物的神秘猜想到《寻找主人的船》对船也有灵性的感悟,还有《船老板》对“业余萨满”的神奇刻画、《塌鼻子》中对民间神医的神功描写、《十八扯》对于乡民谈论鬼神的魔幻记录,都十分生动地还原了弥漫在民间的神秘氛围:那是唯物主义教育怎么也祛除不了的原始思维,是深深扎根在大地中的巫风,还是人的智力一直难以破解的自然之谜、生命之谜、宇宙之谜。这样的神秘诱惑着从思想家到普通百姓的各种人,从古到今,代代相传。而这,也是我们的文化之根——神秘文化之根。贾平凹的《太白山记》写各种魔幻的梦境,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写转世的传奇人生,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讲述萨满的神奇,都在展现神秘文化的不可思议、叩问神秘文化的深不可测方面,显示了作家的灵性与才华。万物是否有灵?灵魂是否不灭?还有多少不解之谜昭示着人的局限性?还有多少神奇的故事在到处流传?遥想当年,屈原发《天问》,提出的宇宙之谜、世界之问,多么玄妙!世界上多少事,是人所不可知的神秘!写出了这一点,就写出了东方神秘主义的奇妙。那些神秘现象催生的神秘文化心态既昭示了永恒的困惑,也展现了文学的瑰丽。尽管有些

神秘现象与蒙昧有关(例如《爸爸》中描写的悲剧),但仍然有不少作品写出了神秘的瑰丽。这一点,是当代文化小说的一大看点。

#### 四

当然,不仅仅是神秘。我读《非法法也》《各种抗税理由》,还感受到那里民风的强悍:“民性刁滑而且蛮横……做事总是‘不服周’。”因为“不服周”而率性作为,因为“不服周”而好冲动,这是楚人最突出的精神特质。从当年的楚霸王到晚清的铁血湘军、民国的秋收起义、平江起义,都体现出这一点。韩少功的小说《爸爸》中关于“打冤”的描写,《鞋癖》中关于清代澧州民变、遭到官军血腥镇压的记录,还有《山南水北》中《残碑》《拍眼睛及其他》对于历史上杀人血腥故事的刻画,也都体现出作家对当地民风的感慨: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蛮劲,驱使一代又一代的楚人干出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业,也上演了多少出惊世骇俗的悲剧!

萧兵先生曾经指出:“《离骚》尽管庄重、典丽、飘逸,但更有一重热烈,一种放浪,一阵嘶喊,那来由也不仅是个性的,而也有那个‘时代’的大胆,那个‘地方’的狂放,那个‘民风’的强悍。”<sup>[6]</sup>然而,那热烈、放浪、强悍的心劲一旦转入人与人之间的斗争,势必也会上演出特别残忍、极端的悲剧。也正是有了在一方面的记录,《山南水北》才不只是一部当代人的《归去来辞》或《世说新语》,还是一部警世之书。它显然具有提醒人们勿忘历史悲剧的意义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,无论是“伤痕文学”“反思文学”,还是“知青文学”“乡土文学”(如古华的《芙蓉镇》、张贤亮的《河的子孙》、张炜的《古船》、刘震云的《故乡天下黄花》、阎连科的《坚硬如水》、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、毕飞宇的《平原》……),还有众多的“纪实文学”(从胡平、张胜友的《历史沉思录》、杨匡满、郭宝臣的《命运》到邓贤的《中国知青梦》、杨显惠的《告别夹边沟》、杨曦光的《牛鬼蛇神录》……)都一直在敲响勿忘历史悲剧的警钟。那些混合着血泪与思考的文学,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有了格外醒目的位置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作家那些记录悲剧的文字在全书中占的比例并不多。当作家在书的末尾写下《秋夜梦醒》《遍地应答》那样令人感慨万千的文字时,他写出了怎样的怅惘之情啊——“将来……我们将在那个世界里缺席,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”“想想看,这里无处不隐含着代代逝者的残质,也无处不隐

含着一代代来者的原质——物物相生的造化循环从不中断,人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短暂一环。”这样的文字一下子使人想起了“逝者如斯夫”的喟叹、“人生寄一世,奄忽若飘尘”的长吁,以及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也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”的永恒感慨。这样的感悟,交织着人生的五味,只有人过中年才会有真切的感受。这样的感慨一下子盖过了记录神秘趣闻的好奇、凝思苦难的深沉,透出无限的玄远与感伤。在社会的飞速转型中,几十年时光飞逝而过。“50后”这一代人也在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暮年。这一代人经历过的苦难往事、改革风浪、世俗喧哗似乎都在转眼间随风而逝。他们中的优秀作家记录下的可贵文学会留存于历史的记忆中。虽然,对于他们有过的狂热与迷惘、追求与思考,到了“70后”“80后”那里,已不可思议,虽然,新的时代已经催生了新的活法、新的追求,但“50后”经历过的一切都不会化作云烟。就像今天的人们记得历代文学名作一样,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能够经得起时光浪涛拍打的永远的纪念碑。

#### 五

随着“中国文化热”的持续升温,“寻根”运动越来越显示出了文学家的远见。只是,一方面,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把越来越多的历史之谜端在了当代人的面前,另一方面,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那里,“戏说历史”的风气早已经消解了“寻根”的浪漫豪情。当年的“寻根派”多有过下乡的经历(韩少功、李杭育、阿城、郑义、王安忆都是下乡知青,贾平凹、莫言都是在农村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光,只有郑万隆是“文革”前大学毕业生),对于乡村有深入的了解,也在知青生活或后来的大学生活中认认真真读了一些书。这一切为他们的“寻根”写作打下了鲜明的烙印:寻找深深植根于大地的民间文化之根(包括神秘文化之根,如韩少功的《女女女》对楚风楚魂的追问、郑万隆的《我的光》对萨满文化的现代性的发现,等等),并因此而与国际文坛上的“寻根”思潮呼应——从墨西哥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《玉米人》、美国作家哈利的《根》到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《一日长于百年》,以及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……还与那些回首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辉煌业绩的文学作品(从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、唐浩明的《曾国藩》、刘斯奋的《白门柳》到凌力的《少年天子》、二月河的《康熙大帝》……)区别了开来。

如何将“寻根”的事业进行下去?这个问题值得研讨。

我注意到,一方面是新的全社会的“传统文化热”在持续升温,弘扬了传统文化的“正能量”(如果联系上读书界长盛不衰的“武侠小说热”尤其是“金庸热”,则“传统文化热”可谓源远流长啊);另一方面是“70后”“80后”作家的历史题材创作呈现出相当鲜明的批判色彩——从李冯的《孔子》对孔夫子周游列国的质疑到笛安的《南方有令秧》对传统礼教的辛辣嘲讽,还有电视剧《甄嬛传》对宫斗黑幕的揭示,都与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、韩少功的《爸爸》、莫言的《檀香刑》(其中对酷刑的描写令人痛苦不堪)、刘震云的《故乡相处流传》(其主题是冷嘲历代统治者对民众的愚弄)……对传统劣根的批判息

息相通。在此起彼伏的“弘扬”与“批判”中,传统文化之根的错综复杂、一言难尽才得以呈现出丰厚的底蕴。

如此看来,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过是非,还有待作家们持续的深入追寻……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林伟平.文学和人格——访作家韩少功[J].上海文学,1986(11).
- [2]韩少功.答美洲《华侨日报》记者问[J].钟山,1987(5).
- [3]韩少功.人的逃避[J].小说家,1993(3).
- [4]韩少功.我的写作是“公民写作”[N].南方周末,2002-10-14.
- [5][捷]米兰·昆德拉.小说的艺术[M].唐晓渡,译.北京:作家出版社,1992:19.
- [6]萧兵.楚辞文化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0:264.

[责任编辑 杨捷]